



创造的乐章

去劳动,去创造,就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。

当劳动者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,他们创造的乐章,已化作江河上的帆影、大地上的诗行,激荡成昂扬澎湃的生命交响。

——编者

4月4日,在电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播出结束190天之后,我回到华坪女高,再次见到了张桂梅老师。她还是那么风趣、坦诚、可爱,聊天时妙语频出。张老师对我说:“在愁绪当中有高兴,在高兴之中有奋斗,在奋斗之中有眼泪,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?”我看着她,她的眼睛亮亮的。

张老师的眼睛一直有光。在《山花烂漫时》开拍前,我去华坪体验生活时就观察到了。她也愁,也烦,也急躁,甚至会急得转圈儿,但这些都是为了工作。她的内心是充盈的、积极的、快乐的,她本人是刚强的、仁慈的。所以,她的眼睛总是明亮的。

作为演员,我是幸运的。在光影中,我与无数女性相遇。她们是故事里的人,更是无数真实女性的缩影。她们为理想奋力拼搏,在生活琐碎中倔强生长。而我,在与她们同行的路上,一次次被点亮。

《回响》中的冉咚咚是个刑警。我提前15天进组,在当地刑侦大队体验生活,跟随刑警们参与案件研讨会,观察他们的工作状态。我记录了许多细节,比如他们长时间盯监控时揉眼睛的小动作。刑侦大队的同志们像旋转的陀螺一样忙碌,我们的对话总被不断响起的电话打断。面临巨大身心压力与家庭责任缺失的挑战,他们始终在工作中展现出忠诚、笃法、睿智和勇毅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的吕潇然是个飞行员。穿上飞行员制服那天,我在镜子前敬了个军礼。作为阅兵仪式的备飞员,吕潇然练习了成百上千次,却在关键时刻甘愿成为“替补”。拍摄时,我站在停机坪上仰望战机划破长空,突然理解了这份遗憾背后的壮阔——有些光芒,未必在聚光灯

我把考古写成歌

王 巍

我母亲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,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记得家里1964年买了架风琴,妈妈一有空就弹琴唱歌,我和两个妹妹有时跟着一起唱,这应该是我的音乐启蒙。

70年代,家里有了收音机。广播电台经常播放李光羲、贾世骏、蒋大为等歌唱家的歌,我边听边模仿,不知不觉,歌唱水平逐步提高。一天下午,我手拿一首歌的简谱,看着看着就唱出来了,真是神奇。

1982年,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。我用头几个月的工资买了台双卡录音机,一有空闲时间就听歌。虽然科研任务繁重,考古发掘艰辛,却没丢掉唱歌的爱好。2010年8月,我们考古研究所迎来建所60周年。当时我们举行了一场晚会,请考古院所以及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大专院校都参加。作为研究所的代表,我上台演唱了《父亲的草原,母亲的河》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数百人的大礼堂独唱,认真练习了很久,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

2019年,我创作了第一首歌。新冠疫情期间,我被白衣天使感动,想为他们写

述就是电影的一部分。”

正式上岗那天,将近两小时的电影,我的注意力全程高度集中,但偶尔也卡壳、踩不准口述时间点。说实话,我真没做到“隐身”。影片结束我收起话筒时,一位戴着很厚镜片的老先生向我走来。“第一次听你的声音,你是新来的吗?”他关切地问我,接着说,“这个电影我在家‘看’过,但没‘看’懂,演着演着就没有人说话,再听到说话时,故事好像就变了,剧情连不起来。今天我终于‘看’懂了,谢谢你!你的声音很好听。”老先生的一番话,对我是莫大的鼓励。为盲人讲电影的职业生涯由此打开。

此后8年,我讲了百余部电影。为什么盲人这么爱电影?时间长了,我心中渐渐有了答案。对大多数盲人来说,“看”电影是了解外界的窗口。电影生动讲述着古今中外、天南海北的故事,这对行动不便的盲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触达。看电影也是社交,在约定好的时间来到电影院,与或相熟、或陌生的人一起看场电影,谈谈最近的事,生活也有了赴约的仪式感。更重要的是,看电影是走向更广泛沟通的路,一部正在热映的影片,盲人与视力正常人一起看,彼此间便有了共同话题,以此为契机,便能走近对方。

我国有超过1700万视力障碍人士。他们无法完整地欣赏屏幕中的光影流动,但对艺术的爱并未削减半分。5年前,毛卫义第一次走出家门“看”的那场电影是我讲述的,而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走了那么远的路——庆幸,那天的电影没有辜负他的一场奔波。

(作者为中国盲文图书馆口述影像讲述员)

与她们在光影中相遇

宋 佳

下绽放。作为演员,我们何尝不是在一次次“备飞”中等待属于自己的起飞时刻?工作的价值从不局限于被看见,而是在无人知晓处依然全力以赴。

《祝你幸福!》中的白慧和《中国医生》中的黄佳慧是医生。她们穿上白大褂,在高压环境下展现出坚韧、责任和勇气,以专业的精神和人性的温度照亮黑暗。在救治患者之余,她们更是患者的精神支柱,展现出一种温柔而强大的气质。

在《祝你幸福!》路演时,我观察到许多女性观众因白慧的故事落泪。或许她们有着不可说的小伤痛,借着这部电影在电影院里哭一哭。如果观众能把眼泪留在影院,然后走出影院带着酒脱继续前行,那便是文艺创作带来的力量与祝福。

《好东西》中的王铁梅和《盛装》中的陈开怡是媒体工作者。演陈开怡时,我常想起那些在传统行业中坚守的女性——她们或许固执得“不合时宜”,却为时代留下了珍贵的注脚。而王铁梅巨大的职业转折,展现了这个人物的韧性 with 适应力。

每次塑造完一个闪闪发光的女性角色,我总会收获观众的认可。观众将我看作是独立、积极、乐观的女性代表,这大约是对我的谬赞。我只是一名文艺工作者,我的职责就是把我的角色诚实地传递给观众。至于展现出某种力量、散发出某种光环,那都是属于角色的,它们不属于我。每当我回望这些角色,我笃信,我在塑造



她们的同时,她们也在塑造崭新的我。

这些不同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们,用“怀着大爱做小事”的英勇姿态对抗虚无。带着一颗利他的心,“不惧碾作尘,无意苦争春,以怒放的生命,向世界表达倔强”。

如果说演员是一个容器,那么这些闪闪发光的女性角色,就是注入其中的星河。我愿意永远做一名虔诚的传递者——将她们的光,洒向更远的地方。

(作者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)

上图为宋佳在华坪拍摄《山花烂漫时》期间与张桂梅合影。 宋 佳供图

子,却不能常把父母照应,舍小家为大家,要为中国考古贡献终生……”创作过程中,我脑海浮现的就是考古人工作生活的一幕幕场景,旋律喷涌而出。我觉得,考古百年还应该有一首对百年中国考古回顾的歌。我请我的好朋友、词作者李勤人来写歌词,很快就形成了歌曲《百年心语》。此后,我相继创作了《考古队员之歌》和专门写仰韶的《仰韶之光》。我还邀请词作者刘新圈创作了歌曲《一梦千年》。

为考古创作的这5首歌曲,我请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朋友进行了编曲、录制。其中的《我是中国考古人》《百年心语》《仰韶之光》,我还请在河南做影视的朋友做成了MV,专门加了考古学前辈的影像在其中。《我是中国考古人》由我的好朋友、海政文工团的作曲兼指挥雪野编曲、录制,他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合唱团演唱。我一听到录音就特别激动,歌词的气势和情感都很准确地表达出来了。让我更感动的是,合唱团一听是中国考古人自己写的歌,坚决不要报酬。

这5首关于考古的歌曲是我个人音乐创作生涯中最有意义的。后来,我先后为多个考古遗址创作歌曲,比如三星堆、良渚、贾湖遗址。音乐创作使我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。歌曲的创作都是有感而发,何乐而不为!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)



鼓楼西夜校里的“戏剧人”

周飞亚

暮春傍晚,暖风轻拂。大福踮着步子挪进北京小八道湾胡同6号院。痛风发作,他本不应出门,但这天是鼓楼西夜校的即兴剧场戏剧培训班上课的日子,他不想错过。

43岁的大福,从事IT行业。学表演、练舞蹈、脱口秀,他的兴趣班“报得很杂”。“但只有这个课是我一定会来的。”他说。

2024年的惊蛰那一天,鼓楼西夜校正式“开学”。这是这家民营小剧场成立10周年之际推出的创举。它来自剧场创始人李羊朵的一个念头:建立一个兼具精神充电与生活赋能的学习园地,供大家在业余时间自我拓展,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。在她的理解中,剧场,不仅是演出的地方,也应该有更多文化功能。

成立一年多来,夜校已“开课”百余场,有大师工作坊、围读会、演读会等多种形式。即兴剧场是其中最抢手的。为了大家的体验,即兴剧场每期的报名人数控制在15人左右。夜校“校长”小树说,每次都是“偷着上架”,还没来得及官宣,名额就被一抢而光。学员们建了微信群,小树鼓励大家互相转让体验名额。如今,群里已经有快200人了。

和大福一样,来这儿上课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表演经历。对他们来说,表演不仅是一种技能,也是内心的疗愈。出差路过,来体验的;初到北京,来找归属感;工作压力大,来解压的;不知怎样更好地跟人打交道,来学习的……

在“教室”楼下的咖啡厅,小树见过送孩子来的父母在等待,也见过陪妈妈来的孩子

在老一辈的记忆里,劳作是伴随着歌声的。那些回荡在江海田间的号子,飘扬在高山河谷的山歌,还有萦绕在纺车旁的呢喃小调,都协调着劳作的节奏,浸润汗水与希望,滋养出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中记载,先民们搬运巨木时发出“邪许”的呼号。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歌“举重劝力歌”——劳动号子的雏形。翻开《诗经》,劳动者的歌声此起彼伏:《齐风·还》中的矫健猎手协作围捕猎物,场面激烈;《周南·芣苢》里的女子采摘车前子草,有唱有和;《魏风·十亩之间》的采桑女们将桑叶采满筐篚,一路欢歌。在劳动中放歌,是中国人民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人生智慧。

号子是劳动者最直接、最坚定有力的生命之歌。滚滚黄河,撑杆的老船夫喊出“你晓得,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?……几十几个那艖公哟哟来把船来搬?”这是搏战自然的呼号,也是对人生的千钧诘问。千里川江,一声“开船嘞,哟哟哟哟哟”撕开翻滚的江雾。“拦马泡来尖嘴流,再凶没得我们强……”水流平缓时,唱《平水号子》《数板号子》,悠然诙谐;激流险滩时,唱《见滩号子》《闯滩号子》,豪气干云。几十种类别的川江号子深深嵌入艖公的生命,成为他们在长江三峡间生活的精神伙伴。除了船工号子,舂米、打麦、搬运、伐木、采石、车水、夯土等各类劳动,皆有对应的号子。号子声,为劳作乐章增添了多重变奏。

若将号子比喻为集体劳作的鼓点,那么山歌便可看作劳动者的独白。山歌内容丰富,节奏自由,表现手法多样。“劳者歌其事”,山歌中有很多描写劳动的题材,歌词即兴创作,颇具魅力。

黄土高坡上,赶脚送货的汉子对着远山甩出一曲《赶牲灵》,“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喂,三盏盏的那个灯”;云南山谷里,牧马的阿哥向着翠岭吟唱《放马山歌》,“马无夜草不一定会胖,草无露水不会发”;贵州村寨里,仡佬族的豆腐阿伯伴着磨盘的吱呀声,悠然哼起《推豆腐歌》:“一颗豆圆又

圆,推成豆腐成钱线,人人说我生意小,小小生意赚大钱”;新疆阿昆苏的金色麦浪间,壮实的巴郎子迎着微风,畅快唱起《收割歌》……目之所及,心之所想,都被唱进了歌里。

相较于号子和山歌,小调流传范围更广,短小规整,表现形式更加细致,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如,南方地区的《采莲》《摇船》《补缸》,北方地区的《四季生产》《摘棉花》《割韭菜》,江浙一带的《卖花线》《洗菜心》,中原地区的《绣花灯》《纺棉曲》,流传各地的《长工调》《叫卖调》等等。劳动小调生长在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,在田埂、厨娘的灶台和亲人的纺车旁,不断吟唱,轻轻摇晃。

近现代以来,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改变,劳动音乐有了新的形式。《二月里来》《兄妹开荒》《南泥湾》《军民大生产》等一批歌曲脍炙人口,广为流传。1947年,作曲家马玉可到黑龙江佳木斯发电厂义务劳动时触发灵感,在《工人四季歌》的基础上创作出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,用劳动号子“一领众和”的方式重构出工业时代的劳动赞歌。

当蒸汽马达的轰鸣声取代了黄河纤夫的信号,当自动化生产线的设备让纺车声成为过往,那些曾经回荡在山川河谷、市井作坊的劳动歌声,在时代洪流中悄然更迭。一些歌声远去了,还有一些歌声从民间走上舞台,用新的方式继续传唱。

2024年秋天,歌手刀郎在演唱会上唱起重新演绎的《川江号子》,全场近两万人加入了这场大合唱,熟悉又陌生的旋律里,人们热泪盈眶。这一刻,我们恍然发现,劳动的方式变了,歌唱的形式变了,但歌曲中凝聚的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,代代相传,声声不息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)

向阳花已不会害怕

庄济宇

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乐队带出来!

我记得最开始,主唱的孩子对话筒是躲闪的,吉他手、贝斯手站在原地畏畏缩缩地弹奏,能看出孩子们内心深处的不自信。怎么攻破?先让娃娃们敢于发出声音,再陪他们一遍遍练习台风和演奏状态。我手把手反复示范指法和动作,鼓励娃娃们想象前方有很多观众为他们喝彩。渐渐地,娃娃们投入音乐演奏中,身体跟着节奏有了轻微律动。

“向阳花/如果你生长在黑暗下/向阳花/你会不会害怕……”当拿云乐队排練的第一首歌《向阳花》的鼓点和吉他扫弦的声音从吉他教室传出时,我晓得,这些山里的“向阳花”已含苞待放!此后,我又给他们教学了《为你唱首歌》,“每一个天使都热爱美丽,所以我懂得你珍贵。”排练时,娃娃们眼里有光,我知道他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了快乐和向上的力量。就这样,音乐之声开始在石印的巨山中回响。

去年11月,拿云乐队受邀参加巫山县神女杯艺术电影周的闭幕式演出。鼓手发出信号,吉电他、贝斯的扫弦声响起,石印村小的乐手们在有几千名观众的舞台上,大方演奏。当全村小的学生高高举起向日葵,面带纯真实笑容登台的那一刻,咱们山里娃的“向阳花”已然绽放!

当主唱把心爱的乐器带回家,当吉他手拿到作为毕业礼物的吉他,当鼓手用两根木棍来想象敲架子鼓,当贝斯手开始酝酿要写首歌,我看到了音乐给娃娃们带来的变化,也找到了自己投入乡村教育事业的那份值得。

(作者为重庆市骡坪片区小学教师)

▼拿云乐队演出照。

尹诗语供图

